

## 抗战烽火中的一段传奇

■陈平原

在撰写《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时,有三个难题,我意识到了,但没能很好解决:第一,前方战事与后方学术如何互相勾连;第二,是否公开谈论伪北京大学与伪中央大学;第三,怎样叙述存在不长但影响深远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这些都不是“禁区”,是我自己的问题;在写作方式、史料运用与学术立场之间,存在某些不太好弥合的裂缝,再加上时间紧迫,只好暂时搁置。

收到张在军《西北联大:抗战烽火中的一段传奇》书稿时,我着实吃了一惊。此前读过他的《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了解其学术热情与工作经历,而辨析头绪繁多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可比描述武大教授故事或乐山的抗战文化遗迹要困难得多。

最近几年,有感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如日中天,与之相对应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则几乎默默无闻,相关“后人”很不服气,于是奋起直追,有了每年一届,相关学校轮流坐庄的“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前三届会议论文集已经刊行,那就是方光华主编的《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何宁主编的《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Ⅱ:纪念西北联大建校75周年》(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2014年)以及刘仲奎主编的《第三届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论文集》(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年);主办第四届(2015)、第五届(2016)论坛的天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想来也会有成果推出。加上此前姚远主编的《西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不久的将来,关于西北联大的功过得失,会成为中国教育界的热门话题。

凡谈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都须直面这么一个残酷的事实——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九年一贯不同,真正完整的拥有六个学院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存在时间只有三个多月(1938年4月—7月);随着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的“挥手自兹去”,余下的四个学院也只维持了一年多。1939年8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正式解体,此后便是“五校分立,合作办学”的阶段。这也是西北联大难以声名远扬的重要原因——即便各校合作无间,毕竟已各自独立门户。同在陕西城固还好说,日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迁走兰州(1941年)，“联大”更是成了遥远的记忆。

从奉命西迁,三校(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合一,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到翻越秦岭,移师汉中,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这一段历史线索清晰,很好叙述;比较难说的是“解体”与“复员”这两个关节点。“将西北联大解体分立最主要、最深层次的原因应是国民政府开发西北、完善西北地区高等学校战略布局长远考虑;而防共控制的政治动机多少也介入了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强化并加

速了政府要将西北联大解散分立的决心。”张著的以上论述大处着眼,扭转了上世纪60年代单纯强调“防共控制”的偏颇,颇具眼光;至于如何看待抗战胜利后各大学的“复员与留守”,张著采用文学性语言,描述“西北联大分立的五个院校像蒲公英一样播撒在西北大地,生根、开花”,结论是:“若从中国高等教育对国家发展的贡献这一视角去审视它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北联大的丰功伟绩不亚于西南联大,甚或有超越的事功。西南联大只有一个师范学院留在了昆明,主体全部回迁。”这就有点过了——处处以西南联大做比较,非压过对方一头不可,反而是不自信的表现。

我当然知道,这是近几年西北联大论坛的主调,并非张君的独创。在我看来,如此高调的论述,属于事后诸葛亮——因应今天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以及各校历史溯源的需要,过分夸大了国民政府决策的合理性,更不要说执行力了。确实有开发大西北的言论,找到相关资料并不难,问题在于如何落实,以及在抗战全局中的位置。漫天烽火中,各大学的分分合合,有很多不得已的因素,硬要往好的方面说,历史就变得一片光明了。除了人事纠葛与利益纷争,还有两点不能忽略:一是战事发展,二是所在地物质供应能力。这些都不是大学本身所能控制的。在这个意义上,谈抗战中的中国大学,必须有更为宏阔的视野与胸襟。

张著序章“辞别燕都”的第二节

“历史选择了西北”,以及第五节“半路杀出个河北女师”,还有第二章“昙花一现的西北联大”的第五节“‘公诚勤朴’——校训与校歌”,以及第十节“解体分立:一石二鸟”,都写得很不错,有许多我不熟悉的材料。下编“五校分立”介绍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各自的历史渊源、组织框架、校长及教授、课程与活动等,有点贪多求全,且不时旁枝逸出;过分排比校史资料,这样一来,可供作者驰骋才华的空间就不太大了。

办教育的好处是,再糟糕的年代,也会有好学生(多少是一回事),以及值得追怀的人与事。关键看投入产出比,以及你论述的参照系。对比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陪都重庆的中央大学、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乃至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困守陕西城固的西北联大,整体形象及办学水平并不占有优势。这里有各种外部条件的限制,我们应尽量回到那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体谅先贤办事的艰辛,给与充分的表彰。大凡喜欢西北联大这个话题的,多少总有一点“打抱不平”的意味,这完全可以理解。如何兼具“理解之同情”,又避免刻意拔高,是学术成熟的表现。因为,面对大量史料,长期浸淫其间,很能不受感情因素的影响。

张著徘徊在史学与文学之间,偶有铺展过度的地方,但其对于研究对象的饱满热情,以及对写作时的条分缕析,对于普通读者了解这所早已被遗忘的大学,还是很有意义的。

张著序章“辞别燕都”的第二节

张著徘徊在史学与文学之间,偶有铺展过度的地方,但其对于研究对象的饱满热情,以及对写作时的条分缕析,对于普通读者了解这所早已被遗忘的大学,还是很有意义的。

张著徘徊在史学与文学之间,偶有铺展过度的地方,但其对于研究对象的饱满热情,以及对写作时的条分缕析,对于普通读者了解这所早已被遗忘的大学,还是很有意义的。

张著徘徊在史学与文学之间,偶有铺展过度的地方,但其对于研究对象的饱满热情,以及对写作时的条分缕析,对于普通读者了解这所早已被遗忘的大学,还是很有意义的。

张著徘徊在史学与文学之间,偶有铺展过度的地方,但其对于研究对象的饱满热情,以及对写作时的条分缕析,对于普通读者了解这所早已被遗忘的大学,还是很有意义的。

## 庄子的魅力

■陈世旭

对庄子的注意始于《史记》。据司马迁说,国王让人带了很多钱去请庄子做宰相,他居然说我宁愿在脏兮兮的小沟里自寻快乐。这么个牛人,据说激动了一代又一代文学巨匠,其作被鲁迅盛赞“汪洋捭阖,仪态万方”,让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其影响下发展。就为这,有机会上大学时我特地选修了先秦的课程,直奔他而去。

庄子的时代,各类野心家、阴谋家“……争于气力”(韩非:《五蠹》)。“无耻者富,多信者显”。但这一切都被所谓“仁义”的帷幕遮蔽了起来;“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篋》)。

庄子不仅看穿了“仁义”的虚伪,同时揭露了“仁义”的残酷:所谓“仁义”,乃是对人性的扼杀。他十分鄙夷地说:“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骈拇》)采取了他所在的那一种时代那一种社会地位的士所能采取的最积极的处世态度:不同流合污,不趋附权贵。同时提出了保持心灵完善不被扭曲,使精神获得充分自由的法则:物物而不物于物(《山木》)。不管荣辱毁誉,或进或退以顺任自然为原则,抱朴而守行,耻于周旋俗务,“……不利货财,不近富贵,不乐寿,不哀天,不荣通,不丑穷,不拘一世之利以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为已处显”(《天地》),守持自己的人生信念,执著专一。显示出一种极高的人格美。

作为哲学概念,庄子的“道”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蕴,一是超越世俗,二是自然无为。挣脱一切精神桎梏,将自然作为心灵的归宿。真正体现了“道”的精神的人,把握六气的变化,游于无穷的境域,就是“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也比不上。大鹏只有乘着风力才能飞往南海,“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逍遥游》)。而真正的精神自由是“无所待”的,没有任何物质条件能够限制。

庄子说过许多否定艺术的话,也说过“彼知颡美而不知颡之所以美”(《天运》),说过“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刻意》)。他显然在事实上并没有排斥美;相反,他把他极力推崇的那种美认定为“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他所说的“众美”没有理由认为不包括艺术美。

庄子对美的指斥和对美的推崇,同样基于他的愤世嫉俗。他指斥诸侯贵族用粗鄙的感官享乐取代精神性审美愉悦,赞赏洞庭之野的“咸池之乐”,说这种大自然在广漠的原野上奏出的乐章是阴阳的和谐来演奏,日月的光明来烛照的天乐(《天运》)。

美是自然之乐。自然是无为亦即无意识无目的的。美是按照这个自然无为的规律化育而成的自然美,无意识无目的自然而达到的境界,而且是美的最高境界:“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天道》)。

摆脱了功名利禄缠绕的庄子,心神融化于自然,绝对排斥世俗的目的论,心灵获得无限自由:“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人间世》)。

从“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知北游》)的逻辑出发,庄子提出了一系列的美学主张:

一、反对以伦理教化作为艺术的唯一目的而伐害美。庄子指出:因为圣人出现,汲汲于求仁为义,天下就开始迷惑,人心失去朴实。礼乐离异了人的真实性情,宣扬“仁义”体现礼乐的六律破坏了与天地之德相和谐的色彩和声音(《马蹄》)。强调“不刻意而高”(《刻意》),“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天道》),大力提倡艺术的真谛。

二、针对儒家理性对心灵活动的箝制,庄子指出并肯定了艺术直觉的存在和作用。“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人间世》)。艺术家有了这样一种感觉与理智相溶合的超越性的艺术直觉,才能真正作出自己的美学选择。

三、强调美与真的统一。庄子要求“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渔父》):“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渔父》)。

庄子是浪漫的。他对自然、对真实性情的崇尚,同南方“洞庭之野”的楚文化生气相通,最典型地体现了与儒家古典主义相对立的充分的浪漫主义。商周文化凝重典实,楚文化则奔放飞跃。正是后者孕育了“寓真于诞,寓实于玄”(清·刘熙载《艺概》)的庄子。“文之神妙,莫过于飞”。庄子……殆得“飞”之机者。”(《艺概》)。

庄子是雄浑的。庄子论美,时常同“大”联系在一起:“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知北游》),天地何其广大邈远,这是最大的美。这似乎成为美的一个法则。这是一种观念,也是一种度量,一种气魄。使一切视野促狭,趋炎附势,营营苟苟于世俗名利者形容卑琐。

庄子是潇洒的。他“与物为春”(《德充符》),将自己的身心、性情、情感的表达直接转移到外物,使自己同对象化为一体:“昔者庄周梦为胡蝶……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此之谓‘物化’”(《齐物论》)。庄子并且由此希望别人读他的文章也应该“……得意而忘言。”(《外物》)。

庄子在自己的生活和艺术中悠然自如,一如庖丁解牛(《养生主》)。为人则一任洒脱,卓然自生,不随流俗俯仰;为文则极尽飘逸,“咸其自取”,如同“天籁”(《齐物论》)。

“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田子方》)。至美,恣肆的艺术表现;至乐,极度的心灵自由;至人,透彻的人生信念。正是这些,使得庄子及其美学观在中国真正的艺术家中产生了极为广大极为深刻的魅力。

## 我与徐志摩后人的交往

■韩石山

徐志摩有子名积锜,子又有子,名善曾。

我说的与徐志摩后人的交往,主要指积锜先生,兼及善曾先生。

1997年,写完《李健吾传》后,领受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任务,写《徐志摩传》。为写此传,购买港台书籍数种,其中有蒋复璁、梁实秋主编的《徐志摩全集》(六辑)。序上说,编此全集,身在国外的徐积锜先生,提供了资料甚多。由此萌生想法,若能从徐积锜手里得些徐志摩的材料,岂不美哉。

于是问海宁徐志摩研究会的章景曜先生,如何与徐积锜取得联系,景曜先生给我介绍了李文哉律师,说是徐家在海宁的代理人。跟李先生说明我的意思,李先生很帮忙,将徐积锜在美国的地址给了我。

当时最想得到的,是传说中的《府中日记》。此事有一段公案,颇为复杂,此处不细说。我去了信,积锜先生的回复,口气有点不耐烦,说他根本不知此事。毕竟是有教养的人,不高兴是不高兴,措辞也还委婉。先说“敝处已无任何资料可寄,实深歉疚”。大概觉得如此峻拒,难以取信于人,又在信的背面写

道:“近年来敌人脑筋失常,外加手抖,故任其事嫌烦,今此事特殊,不敢不答,尤冀原有为盼。”

这是1998年12月的事。

第二年9月,写起《徐志摩传》,交给出版社,编辑想在前面放几张徐志摩的照片。当时坊间流传的,过来过去,就那么几张,人都看腻了,问我能不能找几张新的,别处没用过的。要办成此事,只有再找徐积锜先生。

两年来,《府中日记》的事,已有定论,当初徐积锜确实寄给了陈从周,只是陈从周突然患病失语,以致徐来上海,亦无法说清。现在陈的女儿,从家中书柜底层找见了。信中,我先将这一情况告诉积锜先生,再说想得到照片的事。

这次,积锜先生的口吻亲切了许多,还真的送给我两张照片,只是不是徐志摩的。

关于日记,他说,当初寄陈从周先生时,误寄了两份一样的半本。陈来信说有误,即将另外半本寄与,陈并没有将多余的半本还他。1997年他带子女四人,前往破石扫墓,因他年老,不便再去,带他们看看这个家乡。并率小儿去看望陈从周先生一次,希望能找到那半本《府中日记》,想不到周已言语支吾,虽由其女儿帮同找寻,亦无结果,只好扫兴而归。

关于照片,他说,奉上敌人年轻时照片一张,撒夫妇与子女(四人)的,亦奉上一张。

看那照片背后的痕迹,像是从家庭照相簿上揭下来的。

他的那张,是独自坐在一块石头上。另一张上,是他夫妇与四个儿女(一子三女),刚到美国时,在纽约街头所摄。看得出来,他的妻子张粹文女士,确实漂亮。这张照片,后来出书时,放在了前面的插页上。

这年年底,因为我同时也在编《徐志摩全集》,台湾版的全集前面,有积锜先生写的小序,心想,我这套全集前面,若能由他写的小序,那就太好了。于是写了信去,先生回信说:

11月28日来信敬悉,承不弃,将贵作“前言”之职委之于锜,实不相瞒,锜自1947年出国以来已五十余载,平时除偶尔与朋友书信往来以外颇少应用(中文),中文字已渐忘却,不要说写文章了。故此事实难从命,切祈见谅,勿此作复,以便早日另觅贤者。

我的事也真多,到了200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约我编本《徐志摩图传》。照片都备齐了,编辑说,出这类书,名人之后,常有纠缠不休的,让我最好弄个委托书。想想,只有再求积锜先生了。写了信去,说只是你说知道此事即可。3月12日的回信上,说他同意,并说,“不知此信是否

### 《书摘》杂志 2017年5期要目

冰心说:“《书摘》是我看过最好最有意思的月刊” 李森林说:《书摘》“含英咀华”

我的先生们	张世英	梁启超向曾国藩学什么	唐浩明	
听冯其庸口述风雨平生	冯其庸 口述	宋本蓉 记录整理	故宫里的裱画室	绿 妖
托洛茨基故居墙上的弹孔	毕淑敏	气节啊,你到底还值多少钱	王立群	
印在水上、灰上、石头上	李敬泽	市场究竟有多聪明	冯 仑	
初创时期的中科院力学研究所	[美]杰尔姆·格罗普曼	帕米拉·哈茨班德		
受访者:谈庆明	访谈人:熊卫民、王丽娜	喝茶	金受申	
我在蒋介石身边获取绝密情报	伸懒腰的学问		余 斌	
沈安娜 口述	李忠效 华克放 整理	2017年第5期书摘荐书		

刊号:ISSN1005-2968/GN11-3039/G2 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零售订阅:全国各地邮政局  
邮发代号:82-492 定价:10.00元/期  
地址:(100062)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咨询电话:010-67078683  
银行账号:光明日报社报业集团 建行北京光明支行 1100 1079 2000 5916 6188

### 《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2期目录

主编 韩松林 执行主编 丁帆

#### 大家读大家

阎连科	20世纪文学写作:非故事——一种散马为风的叙述
阎连科	20世纪文学写作:叙述与结构——写作中的新皇帝(上)
王 尧	谈论阎连科的一种方式
文学史新视野(主持人 王彬彬)	
敬文东	小说与日常生活的神秘性
王秀丽 黄晓东	经典作家:是本质的还是建构起来的——以诗人海子为中心的考察
前沿评论	
姚新勇 翟崇光	刘小枫学术转向批判
文学制度研究(主持人 吴俊)	
林敬洁	日本对鲁迅作品戏剧形式的接受及传播
窦金龙	1976—1978年间的文学批评流变

#### 思潮与现象

宋 嵩	在哪里,读懂中国?——以2016年的中篇小说为例
叶 子	“短故事”的游戏——2016年短篇小说略览
作家作品论	
王春林	“七十年代”灰色生存图景的艺术呈示——关于吕新长篇小说《下弦月》
管兴平 黄文倩	论《蟠螭》的精神结构——那些孤寡残弱者的抵抗与救赎——读路内《花街往事》
张春梅	独自漫游——从东君的“感觉”谈起
房广莹	乡土经验与官场文化的博弈策略——评老藤的小说集《熬鹰》
吴雯雯	论贾平凹小说中的青年女性形象
孙 宽	论铁凝小说中的奴性描写